

領袖·元帥·战友

薄一波



领袖·元帅·战友

薄 一 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雨龙

封面设计：王 岐

领袖·元帅·战友

薄 一 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75印张 155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0001——28000册

ISBN 7-5035-0246-0/K·11

定价：3.70元

前 言

这本书收集了我多年来所写的回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等同志，有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生活、工作在一起的李富春、滕代远、谢子长、陈原道、张兆丰、谷雄一等同志，故书名题为《领袖·元帅·战友》。书中还附了近年来我和别的同志共同署名发表的几篇回忆文章。

一九七九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后写过的一篇文章是回忆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怀念》。发表后，受到了国内外一些朋友、学者的注意和鼓励。从这些鼓励中，我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所了解的党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事迹和思想、作风写出来。不期陆陆续续一直写到今年，总算该写的六体上都已写了，于是形成了这本小册子。

这些文章，主要是记述我个人在革命斗争中，与上述同志相交往的事实和见闻。写法上不拘一格，但力求实事求是。由于不少是属于个人接触、个别交谈中的事，虽不算什么“秘闻”，但有些很可能还鲜为人知，尚未见于史籍。对与这些人物有关的一些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历史事

件，我也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回忆文章，无疑是以回忆他人为主，但也免不了涉及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比如草岚子监狱的斗争生活、抗战中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以及建国后的经济工作等，我亦适当进行了一些记述和某些事实真相方面的说明或澄清。抚今思昔，思之所至，也难免发一点自己的议论，目的是想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对当前的实践与认识能有所鉴戒和启迪。

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千万万党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党的历史，丰富多采，博大精深。我这本小册子不过是这历史沧海中的一滴水，但一滴水也可折射出太阳的光彩。本书如能对读者了解我们党的历史，了解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了解和学习革命先辈事迹、高尚品德和献身精神，起到一些帮助作用，如能对党史研究人员和党建工作者也有所裨助，我就感到很欣慰了。

因许多事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误。书中不尽恰当，甚或有错的地方，请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作 者

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

目 录

前 言	(1)
崇敬和怀念	(1)
——回忆毛泽东同志	
再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20)
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29)
回忆刘少奇同志建国初期的一些经济建设思想	(49)
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65)
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成长	(76)
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89)
不能忘却的怀念	(96)
——回忆彭德怀同志	
师长与战友	(112)
——回忆刘伯承同志	
往事追寻忆贺龙	(129)
回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	(139)
经得艰难考验时	(149)
——忆叶剑英同志	
富春同志永在	(161)

0186/05

怀念谢子长同志.....	(170)
一生忠贞 风范长存.....	(176)
——纪念陈原道同志英勇就义五十五周年	
张兆丰、谷雄一两同志就义三十周年祭.....	(184)

附 录

回忆谢觉哉同志革命的一生	(192)
坚强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207)
——回忆滕代远同志	
共产党员的楷模杨秀峰同志	(221)
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235)
——回忆战友郝清玉同志	

崇敬和怀念*

——回忆毛泽东同志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我们伟大的党诞生整整六十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征途中，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历尽艰难，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我们的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我们的事业更加充满朝气，充满希望。

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党和人民，也锻炼出一批党的杰出的领袖。在这些杰出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当纪念党的生日的时刻，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深地怀念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深深地怀念为这个伟大事业奋斗终生、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领导者，深深地怀念立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毛泽东同志！

* 这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而写的，原载于《红旗》杂志1981年第13期。

—

任何一位革命领袖人物，都是在伟大的历史时代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实际贡献，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选择自己的领袖，也要在革命实践中经过长期的观察，才有可能逐渐认识并确定谁真正有领导才能，谁最胜任。我确信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九二七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致使我们年幼的党没有防备、也抵抗不住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大革命失败了。无数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党的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全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向何处去？如何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谁能领导我们继续前进？那时，我和党内许多同志一样都在认真思索这些问题，大家时常议论并留心观察着。我们看到，“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李立三同志的“左”倾错误，相继使革命遭到了挫折；后来，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带来了更严重的恶果。实践证明，他们都不能领导党走向胜利。

二十年代末期，我在顺直省委军委工作，有机会看到党的秘密刊物《中央通讯》。在那个刊物上，我看到过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这十六字诀，是以有革命根据地为前提的，

它生动地体现了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高度概括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原则。还看到过毛泽东同志关于井冈山斗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言论。他对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对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之间、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指明我们党完全可能在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在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区，建立红色政权，发展革命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他还谈到，罗霄山脉中段建立的革命政权不是一般的游击地区，而是革命根据地。建立这个政权，对巩固和扩大割据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那个时期，我们议论过：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建立我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开创井冈山道路，为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当时是做秘密的军运工作的。在大革命失败后，也曾朦朦胧胧地感到应该到农村去发展革命力量，后来又曾想过要搞武装斗争。由于有过这种朦胧的想法，因此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后，认为他的这些主张非常适合当时革命的需要，很有远见和胆识，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觉得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内一位不寻常的战略家。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我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关心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家争论过：上海“一二八”抗战、福建人民政府和张家口

抗日同盟军的性质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参加抗日和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国民党不能用旧的统治方式继续统治下去，因而采取更加狡猾、更能欺骗群众的方式，即“抗日”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就更加反动，我们只应当揭露他们。而我们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当时处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一二八”抗战等行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转向革命、反对不抵抗主义的进步表现，我们应当欢迎，并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双方一直争论不下。

这个时期，我们听到党中央已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还学习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报告等，使我们争论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一九三六年，我们又读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曾经同红军打过死仗，“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这篇报告把我们争论很长时间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和策略上系统地解决了。我们是多么兴奋呀！通过学习这篇报告，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善于掌握前进的航向，用富有远见的战略策略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争取新的胜利。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认定毛泽东同志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对他十分敬仰。出狱之后，我更多地接触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确认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领袖。

二

一九四三年春我去延安，这是第一次到中央去。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找我去谈话。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他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呢。毛泽东同志问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口中反复地说着：“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也许是他为了记住我的姓名。他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西省定襄县人。他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的中都。我当时怔住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翻阅了《史记》，果然如此。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熟悉啊。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又问我：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彭真同志作过一个关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的报告，讲得很好，是马列主义的。接着又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

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毛泽东同志又问到我的经历，我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那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娃娃，不懂什么。他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我说：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是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那时，什么书都读，三民主义的书读过，陈独秀的讲演录读过，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直到入了党，才对马克思主义有点认识，但很肤浅。毛泽东同志笑着说：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我们在北平监狱中的经历。当讲到我们在监狱中的那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时，他联系当时延安整风的情况说：你们的那个争论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当谈到我们在狱中规定了日常生活斗争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保存、锻炼和教育了一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毛泽东同志并问了同时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我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分派到各地去，又回到五湖四海，是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作用的。谈话结束时，他要我开个名单，我随后送给了他。

我还汇报了我们在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一九三六年秋，出狱不久，党就派我们几个人到阎锡山那里去

做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工作怎样做呢？当时我们就是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后所作的报告为武器的。在这前后，我们听说毛泽东同志讲过：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象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象“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七七事变”后不久，刘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太原，传达了洛川会议的精神，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不要受阎锡山的“框框”束缚了。初到山西的时候，小心谨慎地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以合法身份利用合法形式去开展工作，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的策略应当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个重要意见，在策略转变的关键时刻，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使我们避免了迷误。一九三七年秋天，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领八路军来到山西，他们告诉我：你赶快带决死队到晋东南去吧！毛泽东同志说过，要象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加紧反共活动，彭德怀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要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九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之前，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这就是要准备进攻在山西的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的力量。这时，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同志说：

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还说：目前的形势是天下大乱，到处为“王”。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经过艰苦的工作，我们在同阎锡山联合抗日的过程中，大胆地发展党和革命的力量，逐步取得了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山西新军在粉碎顽固派的进攻之后，加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成为我们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抗日武装；牺盟会的上层领导人员和基本会员，绝大多数都站到我们党的方面来了。

当我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教条主义不承认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时候，应该转变我们的策略。这种时候，不仅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还要做大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蒋介石、阎锡山就是大资产阶级。没有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又说：但是，大资产阶级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要警惕他们投降，要壮大左翼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向进步方面转变。他最后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这次同毛泽东同志见面，谈了八个钟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他谈话不感到拘束。他的谈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一句很普通的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赋予新的涵义，使你顿时感到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力量，并从中悟出哲理，同时也使你感到他的智慧的广袤和深

邃。他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善于归纳问题。向他汇报工作，谈问题，他常常用几句话就对你所谈的问题作了结论，使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获得教益。通过这次谈话，我进一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战略家的伟大形象，更加增强了对他的认识和敬仰。

在山西工作期间，我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那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处理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说做统一战线工作要“内方外圆”，而我有时候却表现出内方外不圆，强调了原则性，忽略了灵活性，处理问题有过火的地方，同时，态度也表现得不够冷静。有的统战朋友曾经善意地批评我“好插野鸡翎”。好插野鸡翎，这种气势有时还得要，可以压倒顽固派；但在有些情况下，则往往容易把事情闹僵，加重了解决问题的困难，也就不利于做好团结工作。又如，在处理内部的矛盾上，有时也不得当，有山头的倾向。一九四二年，决死一纵队与八路军三八六旅合并组成太岳纵队。他们不仅原来是两个部分，而且又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与军队之分。处理这种带有多种矛盾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本应按照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的，要待人宽，责己严，多做自我批评。我却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很不够，发生争执时对双方“各打四十大板”，还自以为是“公正”，实际上考虑三八六旅的困难少了，也没有有意识地多宣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有些偏袒曾经由自己领导过的决死队。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在谈到消灭山头问题

时，作了一个比喻，说两个小孩打架，做父母的总得先把自己的孩子骂几句，甚至打几下，然后安慰对方的孩子，才能平息纠纷，老百姓都懂得怎样来处理“山头”问题。这对我很有启发。一九四四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提出的干部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倡议，曾经写了一份材料，检讨我上面谈到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决心改正。当时，毛泽东同志在这份材料上作了批示，指出：“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亲切，谦虚，帮助我正确对待缺点和错误，启发我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把工作做好。至今，我还非常感激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勉励和帮助！

三

我们的党是革新者的党。毛泽东同志作为这样的党的领袖，他是一位坚定的真理探索者。为了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耗费了他的大半生精力，终于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功，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中国创立后，他继续探索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件事。一九五三年春，有一天毛泽东同志约我去谈话。他要我好好地读几本书，读点哲学的书，学点辩证